

王 安 忆

——研究资料

吴义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安忆研究资料 / 吴义勤主编; 王志华, 胡健玲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5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乙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5329—2430—0

I. 王… II. ①吴…②王…③胡… III. 王安忆—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12 号

-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30.75 插页/2 千字/479
印 数 1—2000
定 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此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生平与创作自述

感受·理解·表达	王安忆 (003)
挖掘生活中的新意	王安忆 (010)
难题的探讨	
——给王安忆同志的信	周介人 (012)
“难”的境界	
——复周介人同志的信	王安忆 (019)
生活与小说	王安忆 (023)
关于《小鲍庄》的对话	(030)
生活的形式	王安忆 (036)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	王安忆 刘金冬 (038)
自述	王安忆 (066)
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	
——王安忆访谈录	周新民 王安忆 (071)

研 究 资 料

“心理剧本”中善与恶的研究	
——论王安忆近作对人性丰富内涵的探索	吕 芳 (085)
面对“自己”的角逐	
——评王安忆的“三恋”	程德培 (098)
性文化蜕变中一次新的躁动	

——评王安忆《岗上的世纪》	谭桂林 (110)
王安忆十年创作批判	席 扬 (114)
王安忆的“转型”	吴义勤 (122)
“悲剧的诞生”与“谎言的衰朽”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	韩毓海 (128)
王安忆的新神话	
——一个理论探讨	李洁非 (141)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纪实与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张新颖 (148)
从小城之恋到都市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一个技术问题	朱也旷 (157)
重大的心灵情节	
——王安忆散文创作论	傅金艳 (167)
城市的肖像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南 帆 (173)
营造精神之塔	
——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陈思和 (185)
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突	
——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主题	王向东 (201)
论王安忆	汪 政 晓 华 (212)
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活语”	徐德明 (240)
生长的状态	
——论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王雪瑛 (252)
解读《富萍》，解读王安忆	唐晓丹 (262)
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	
——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	李 泓 (270)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	
——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	张 浩 (282)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倪文尖 (292)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 王晓明 (306)

被复制的文化消费品

——论《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 王艳芳 (330)

不冒险的旅程

——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 李 静 (340)

都市的迁徙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 高秀芹 (363)

由欲到义：情爱的升华

——评王安忆九十年代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王 莘 (379)

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

——王安忆近期小说中的“个人” 周新民 (384)

与时间对峙

——论王安忆的小说哲学 吴芸茜 (393)

沉入常态叙述与呈现诗性情怀

——论九十年代中后期王安忆小说叙事策略 颜 琳 (407)

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误区 赛妮亚 (419)

东方命运观与悲剧意识

——论佛教对王安忆悲剧意识的影响 杜学霞 (432)

附 录

作品年表 王志华 (451)

研究资料索引 王志华 (458)

生平与创作自述

感受·理解·表达

王安忆

我是不大善于总结自己的。我写东西的动机不是那么明白，似乎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写这篇东西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些评论我作品的文章，所分析的往往是我写的时候并未想到的。所以我就感到很难讲，但编辑部的老师们说：“你就谈写作时的具体想法吧。”这样谈倒可以，不过谈出来也许会使大家很失望。

我最初的写作大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成人的东西比较早的就是那篇《雨，沙沙沙》。促使我写这篇东西的，主要还是生活中的一些感想。女孩子长大以后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在马路上走着，突然跑出一个人向你表示一番殷勤。《青年一代》上谈到这类事情时，称这种人为“马路朋友”，并常提醒对“马路朋友”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当然，这样的朋友是不大可靠的，不太值得信任。可是有时候我忍不住要想，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依赖，不要有那么多的猜疑，那么这样建立的感情，这样一种认识的方式也蛮有诗意的，总比那些婚姻介绍所里配给的好吧。自然这是异想天开，事实上绝对不会有人这样跟谁恋爱的，因为没这么大的胆子。这很遗憾，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而且不仅仅是信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也没有了。然而我又总是很不甘心，总想挽回来。虽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磨难，失望很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造成了很重的创伤，可总还不应该放弃这种美好的追求，否则，就太惨了。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一个车站等车，下雨了，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撑着一把伞。他什么也没说，把伞朝我这边送送，让我一起遮雨。汽车开来，他仍没对我说一句话，收掉伞，从另外一个门上车了。我很感动。

《雨，沙沙沙》发表后，收到一些青年的来信，有人说生活中，这样美好的事情是没有的。可是，有趣的是，《文汇报》的一篇专访里写到这段事后，我收到过这样一封信，信中写：“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九十六路车站给一个女孩子打过伞，不知这女孩子是不是你。”这不对，我是在二十四路车站。然而这说明这种美好的事情在生活中毕竟是存在的，人和人的信任毕竟是应该恢复的。

我想谈谈《小院琐记》。我自己回头看看，在一九八〇年的创作中，这篇东西算是比较满意的。《小院琐记》里的那个文工团，是个地区团，我在那里呆了六年，并且就住在那个家属院子里，我对这个院子非常熟悉。家属之间的事讲不清楚，清官难断，吵架特别多，一天到晚地吵，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大致可分为争风吃醋和经济困难两类。就是这样一个小院子，又脏，又破，又窝囊，又贫困。我离开这个团若干日子以后，又回到这个院子。因为那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孩子，画画的，曾被我们团招来搞美工，后来因为在试用期跟团里的一个男青年谈恋爱被除名了。文工团对这些事管得比较紧，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四人帮”垮台后，她考上了大学，仍然和那个男青年好，他是个看不出有什么发展的声乐演员。我去看他们时，他们已经结婚了，就住在那个院子里。他们的新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把破椅子，就只剩下感情了。这女孩子是搞国画的，所有的钱都花在买宣纸、买笔上了，很穷。不过他俩的精神状态很好，那个女孩子说：“其实我们并不穷，只是没有钱。”这句话给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并由此使我想到了整个院子，甚至院子以外的生活。还有那些争风吃醋的，如果没有爱情也不会争风吃醋。生活就是这样，有痛苦，也有欢乐，并且是有了痛苦才会有欢乐。文工团还有不少女孩的出路是给某些干部做儿媳妇。在物质上是可以满足了，有些姑娘年龄大了，不想再呆在文工团，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可是她们幸福吗？也不尽然。如果说《小院琐记》写得还可以，那就是调动了我在那儿比较丰富的生活，自己回头看看，觉得还有点滋味。

再讲讲《新来的教练》。我有一位亲戚在某省体校工作。他是上海的大学体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把他分到一个省城的中学。他教过唱歌，教过英语，也教过世界地理，什么都干，心里却很想搞原来的专业。他是个非常机灵的人，通路子，找后门，送礼请客，烧香拜佛，终于

给他钻进省体校去了。我们国家有很多事情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解决，只能去开后门。而他走这个后门并没要求别的，只是想搞自己的专业。他刚到那里是当女排副教练，正教练是女的。他常常谈起这个人，说她是如何地不懂体育，队员们如何不听她的话，总之，她搞体育纯属历史的误会。当我写这个人物时，就必须替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想着想着，我对她逐渐理解了。她在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位置上，如果她不干体育而是干别的，说不定她能干得很好。当时选中她去打排球，仅是看她个子挺高，成分挺好。我们国家这样的误会很多，这种误会对国家不利，给个人也带来很多痛苦。我和她不相识，但我自己周围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却并不少，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她自己一定很苦恼，工作中有很多障碍，无能为力。后来我便写了《新来的教练》。据说不少人认为那个女教练比那个男教练谷中写得更好一些。

谈谈我写的第一个中篇：《尾声》。

很多人问我：“你写到现在，最喜欢自己的哪篇作品？”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最喜欢《尾声》。可能也有些偏爱，因为《尾声》调动了我在文工团生活六年的所有的生活素材。我想谈谈我写《尾声》的用心，这可能与读者看到的東西并不太符合，但我写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想的。我待的那个地区一级的文工团，前身是一个地方戏的团体，规模很小，在农村城镇串来串去演出。不过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有非常狭隘的地方性，听众不广泛，现已绝种，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后来，有些知识分子进团，带进去一些新鲜血液，慢慢地把它改变了，改成综合性的团体：音乐、舞蹈、曲艺、独幕剧都演。规模仍然很小，流动很方便。到了“文化大革命”，号召搞样板戏，每个地、市级文工团都要搞，而且一招一式、布景、服装、道具等等都要同样板团一致，因此预算也是一样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团体，在这么一个地方是极不合适的，老百姓养不起。而另一方面，文工团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很希望这个团壮大，希望自己的才干能够得到发挥，所以是非常热衷于招兵买马，趁此机会，把团壮大起来。一拉幕，看上去不像一个地区文工团，而像是省级以上的团体。这里就反映了我们国家一个矛盾：脱节。经济非常贫困，而知识分子又提出种种要求；艺术是一种剩余享受，首先要吃饱穿暖才有心情谈及艺术。以前，无须考虑经济问题，它是国营的，工资、营养费不受任

何影响。演出任务也不繁重，演来演去几个样板戏，无人看也不要紧。“四人帮”打倒以后，首先碰到的就是经济问题，要自负盈亏。有很多作品写打倒“四人帮”以后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在实际生活中这是非常艰难的。在生活中，这个文工团，在“四人帮”倒台后日子是难过透了。因此我想通过《尾声》中这文工团的兴衰命运，写出我们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矛盾、人的特殊的命运。当然，写出来究竟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这个团现在还没有度过困难，要解散吧，这么多人员上哪去安排？所以现在给它的任务是，一年给你这点钱，你能混一天就混一天。里面那么多人呢？其中有很多青年，这就把他们的前途都给耽搁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时代在发展，在前进，但在前进的过程中，还有不能尽如人意的事在发生。我是通过一个文工团长的角度来写这个团的。团长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党把他安排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是非常听话的。可这工作他实在干不了，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换的关头，他感到非常茫然。另外还写了一个副团长，他懂业务，很有能力，就是有个毛病，常常和那些女演员有暧昧关系。他不犯大错误，你也说不出他怎么样。上级领导对他非常反感，因此他始终是个副职。我常常想，对一个人，也许不能仅仅用好坏去评价，应该看他对推动生活有没有作用。但话又说回来，就是这样一个能干的副团长，也还是挽回不了这个团的命运。

以上是我一九八〇年的创作。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我曾经想沉默一段时间，考虑一些问题。写过一段，再回过头去看看，觉得不满意了。现在我回过头去看一九八一年的创作，我也很难说是进步还是退步。最近碰到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我最近看了你的《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你好像从上层走到底层了。我听了挺得意的。这正是我的用心，正是我在一九八一年极力想做到的。一九八〇年，我写得比较多，写得也是比较心爱、也较容易的人物，像雯雯这样一种女孩子，精神上很有要求，挺有浪漫气质。她绝对是吃饱穿暖的，也不必为人生更为实际的要求操心，可是生活中更多更多的人还要操心衣食住行。另外，有人说在雯雯这人物身上，我本人的东西较多，自我表现的意识较强，所以我写起来也比较容易、顺手。《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一篇评论，作者程德培同志把我的主人公全部都串成一条线了。我觉得他看得非常准，这里也反映了我写作上的一个弱点：写人物不太善于写人家，光善于写自己。所以一九八一

年我有个打算，打算从自己的圈子里跳出去，写写别人。有人对我说：这是从主观世界走向客观世界。道理讲不清楚，反正应该学会写距离比较远的人。我作了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不太成功。我先谈《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庸常之辈》。《红楼梦》里，不是将女孩子入册吗？我所写的这个人物，是连副册也入不了的庸常之辈。这是一个在生产组工作的姑娘。我是初中六九届的，这届是一片红：插队。回城以后，基本上都是在生产组工作，所以我的同学在生产组的很多。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和他们有距离，谈话的内容很不一致，他们谈的大多数是吃和穿。我心里是挺瞧不起的，认为他们很庸俗，小市民！我有个好朋友，在生产组工作，长得挺好看，找了一个也在生产组的男朋友，现在已经结婚了。她的选择是很值得称颂的。而实际上她只是觉得：我这么一个人，如果高攀，对方不一定会对我体贴。她想得很实际。同样，她工作努力，出发点也很质朴：为了超出定额，得超产奖。我认为，实际上生活是由这些人来推动的。我想写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和雯雯是完全两样的。我写她一天的日常生活。她那时生活的轴心都是在想自己的婚事，她要把这件婚事办得很体面。当然，我们国家很贫困，应该提倡节俭精神。但也应看到，在那些铺张办婚事的后面，很有些可怜的东西。这些女孩子，也许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坐小汽车，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在众人面前扮演主角，只有这种时候她才能引人注目一下。而且，我这个朋友有这么一个想法，她说：“人家都说我们俩都是生产组的，过不好日子，我就要做给他们看看，一定不能把婚事办糟。”她实际上就是用这次婚礼来发表宣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我很有些感动。而通过写作《庸常之辈》，我发现自己对这一类青年有了感情，对他们的轻视打消了。她们的追求似乎很卑微，但用自己的力量，很微薄的力量——一天只有一块二毛（如请假便扣除）——用这么一点力量建立一个家庭，操办终身大事，也不谓不艰难，不谓不平常。

在写《本次列车终点》时，我想得比较多了。“四人帮”打倒了，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了。有些青年已经在当地工作，还是想法子回来了。他们到农村让生产队证明他们没有上学，没有上调，他们不要文凭了，这段历史都不要了，恢复了知识青年的身份，因而取得返沪的权利。回上海之后，当个工人，他也满足，感到很幸福。然而，终究难免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我就是想写他们这种心情。这些青年（……也包括我自己）把上海当

做一个幸福的目的地，以为回到上海以后，便万事大吉了。可实际上归来以后又怎么样呢？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不顺心，生活就是这样不容易。我们隔壁有一家，这次有两个子女回城。回到家里，住也没处住；没房子，对象也难找。于是便很失望，感到没出路。以前在外面的时候，还有一点希望，回沪后连那点希望，即对家乡的那点思念也没有了。生活固然艰难，但他们自己也有弱点，他们对幸福的理解终究是太狭隘了。我就是表现这样一个青年。前几天，北京电影学院来了个学生，想把这东西搞成电影，他们问我陈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他应该是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出身一般家庭，小康之家等等，我说不清楚。写第一稿时，才七八千字，我让陈信一个人走在南京路上，想了很多事情，前想后想，以他的思绪为线索，把他十几年的生活联系起来。写好后再看看，我苦恼起来，因为连自己都没有被打动。也许让陈信一个人独白不行，里面缺少内容，缺少生活。我想，应该写生活本身，就从陈信回上海写起，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然后人家怎么给他介绍对象，又是怎么样碰到了种种困难：房子问题，兄弟的就业问题等等。我下决心把第一稿扔掉，写了第二稿。写出来之后自己还算满意。从这过程中我也得到一个算不上经验的经验吧，作品还是要用生活本身去打动人，光用诗情画意，总是比较肤浅的。

最后，我想讲讲《钟山》上发的《墙基》。有位同志问我怎么会想起写这篇东西的，有没有什么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出发点，我觉得，有时候写东西，就好像生活长期积累以后，这段生活总是存在心里。突然之间，它会起一种变化，会闪烁起来，也不知这算不算灵感。《墙基》里我写了两条弄堂，这一条弄堂里住的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在另一条弄堂里面住的都是城市贫民、工人家庭。我就写他们这两条弄堂里孩子们的命运。这是两个阶层，两个世界，中间隔着好厚的一堵墙。“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很小，最早看到的是剪裤腿、抄家，带了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似乎从此就兴无灭资了，天下大同了。可是靠这样的“斗争方式”能达到吗？不过，人和人中间的墙是一定要消除的，应该有交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也有过交流。我们常常讲，插队落户把一些不同的人的命运勾连在一起了，比如说有很多非常悬殊的婚姻。人 and 人能平等友爱地对话是很美好的，可是这不能靠十年内乱那样的运动。这

篇小说里的生活来自我的儿童时代，我的家曾经在《墙基》中那样的一条弄堂里，隔壁弄堂的孩子家庭比较贫穷，常常跑到我们弄堂里来踢球。他们很野，会骂下流话，我们都称他们为“野小鬼”，很怕他们。听大人说，以前我们是分开的，后来大炼钢铁时把墙拆掉了，果然，两条弄堂间残留着一道墙基。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家里没人，我躺在床上睡午觉，外边有一些小鬼在踢球，把球踢到我的院子里来了。一个小男孩爬进来拾球，他从窗户里看到我的家里没大人，就推门进来，我吓得大叫起来，觉得进来强盗了。可他一进来就看我的书，他说：“哟，你们家有那么多小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还是叫着。他说：“你不要叫了，我看完这本就走。”可他看了一本又一本，没完没了，我拼命地叫，楼下隔壁的人以为我要被杀死了，都跑来，把他轰了回去。现在长大了，回头想想，他也很可怜，不就是要看两本小书吗？可能他家里没有小书，现在长大了回想小时候的事，能看出很多当时想不到的意义来。

这都是一九八一年的创作了，一九八二年已经开始，再照旧的写法写，自己不满意，要有些新的突破。还是要写好人物，写一个真实的人物。我现在很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写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到很多年的历史，很大的一个社会，就像高晓声的陈奂生一样。这很难，这是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的一个方向。

（原载《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挖掘生活中的新意

王安忆

王蒙老师：

您好！在《文汇报》上看到了您的文章《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很高兴，有很多话要和您说。正巧要去北京开领奖会，心想，一定要去找您，好好聊聊。可是您去了山西，很失望，只能给您写这封信了。

您对我提出了“下一站”的要求，这正是我在考虑并有些茫然的。每写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往往是一整年），我总会无可奈何地停下笔，似乎有一种写空、写尽、写不出来的感觉。这时，我常常很忧虑，很焦灼，怀疑自己到顶了，到此为止了。尤其是当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停滞的时候，心中的恐慌是无法形容的。那是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之间，那时候，我的作品几乎全是在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表现她的欢乐、痛苦和希冀，也带有我自身的一些东西。我写起来很顺手，也很亲切，就好像在自我抒发。可是，一个年纪轻轻的雯雯是经不起这么左写右写的。不用别人说，我自己也觉得单调，不耐烦了。老路不愿走，新路呢？一时又看不到，真是苦恼万状。有时去农副产品市场买菜，见很多年轻的小贩，站在寒风中，辛苦而狡黠地推销自己的货物。这些人与雯雯是多么不同啊！可是他们既然存在了，就有他们的合理性，就不应该轻视他们的存在，为什么不能表现他们呢？我顿时冲动起来，写了小说《野菊花，野菊花》，我竭力呼吁：人和人应该平等，应该相通。后来据晓立阿姨说，您谈起过这篇小说，认为比较“浅”。当时，我可是很不服气呢。当然，不管怎么样，这个难点就是这么闯过了，我决心写一些和雯雯不大一样的人物，比

较低层的人物。目前又停滞了。因为有了前一次的经验，我不那么着慌，可仍然是苦恼。回头看看这群“小人物”，又不满足了，我感到确有点“浅”。也许我并没有真正地认识他们。这些意识很朦胧，可是您一下子把它挑明了，您说：“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根据要求她比小方或者陈信站得高一些，有更高的境界。”是的，仅仅同情是不够的，是不能真正认识他们的。我想到了阿Q，如果鲁迅仅仅是“哀其不幸”，就不会有阿Q了。我想到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契诃夫的小公务员，高晓声的陈奂生……仅仅用同情是写不好这些叫人难忘的人物的。我确实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更深、更远一点。

我想起，一九八一年初，当我把我要以那种“博爱之心”来写小人物的想法告诉晓立阿姨时，她就说：“这样恐怕很有限。”可我当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条出路，固执得要命，没有把这话听进去，今天想想，真是有点好笑。如果当时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也许这一群“小人物”会有一些深度。然而，事情却往往是这样，不走完这段路，就懂不了这段话。走一段，明白一点；再走一段，再明白一点。只要不懈地走下去，总会明白很多的。这么一想，也就不遗憾了。

“下一站”，已不那么朦胧，心里有了一种充实感。奇怪得很，明明还是这么点年纪、阅历和生活，有时感到写空写尽了，有时却感到想写的东西直往外涌。我想：也许是因为对生活的认识有了变化和加深，于是，生活又奉献出全新的内容。

细想想，写作也有说不尽的幸福，它逼着我们去挖掘生活中的新意，使日常生活变得丰富美好。这足够抵消所受的辛苦和委屈了。

不多说了，就这些。祝我顺风吧！

（原载 1982 年 4 月 22 日《文汇报》）